

#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 ——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张 越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文学翻译;葛浩文;《红高粱家族》

**中图分类号:** H31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17)01-90-06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但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空间,同时也将翻译主体提升到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功不可没,被誉为莫言作品在西方世界落地生根的“接生婆”。《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本文以《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例,以列举大量实例的方式分析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彰显,以期更全面地了解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主体性的发挥。

### 一、葛浩文与《红高粱家族》

葛浩文是西方最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之一,被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sup>[1]12</sup>“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sup>[2]</sup>他笔耕不辍,在过去的20年成功译介了萧

红、莫言、苏童等诸多中国作家的五十余部作品。葛浩文的翻译创作出了海外的莫言,激活了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第二次生命”。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至国外最多的一位。<sup>[3]62</sup>葛浩文坚定地把莫言称为他的“英雄”。<sup>[4]</sup>在他看来,莫言是其所处时代“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最有创造力的作家。”<sup>[5]29</sup>《红高粱家族》是一部壮丽的战争史诗和爱情传奇。故事背景涉及抗日、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这类巨变事件。1994年,《红高粱家族》经企鹅现代经典丛书出版,这一版封底引用谭恩美的话:“莫言的声音将传入美国读者的心房,如同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sup>[6](114)</sup>学者英奇亦评论道:“和福克纳一样,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莫言称为文学创作界真正的天才。”<sup>[7]506</sup>可以推测,随着莫言获奖,中国文学将更能吸引世界的目光。

收稿日期:2016-02-15

作者简介:张越(1992-),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 二、文学翻译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sup>[8]</sup><sup>[22]</sup>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是译者主体性的三大特征,并辩证统一地存在于翻译活动中。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彰显。“译者的主体性主要通过选择在翻译活动中选择原文、理解原文、表达原文和应用翻译技巧等表现出来,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sup>[9]</sup>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承担起“读者”、“阐释者”、“作者”的三重身份。“文本选择”是翻译的第一步,任何翻译活动均有明确的目的。译者作为“读者”,可在对比研究基础上,自行进行翻译文本的选择。“文本解读”阶段需译者承担起“阐释者”的角色。此过程涉及译者与原作的“视域融合”,需要译者打破自身文化的束缚,主动走进作者的世界。“翻译过程”是翻译活动的重中之重,此阶段译者作为“作者”,可通过对翻译策略的自主选择实现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再创造。总之,译者需妥善处理本国文化与异域文化,达到翻译的和谐性。

## 三、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红高粱家族》英译中的显现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从选材开始,就需译者深思熟虑。其次,面对原文中的诸多特色文化因素,译者需进行文化解码,承担起“阐释者”的重任。最后,面对源语中复杂的文化现象,译本中的选词用词,也需译者精心选择和推敲。葛浩文在其译作中恰当地发挥了译者主体性,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有效传播。

### (一)文本选择

葛浩文的文本选择首先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充分发挥了译者的能动性;所选文本考虑市场及美国读者的喜好,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体现了文本选择的受动性;所选文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实现译者帮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的,从而体现了文本选择的为我性。

#### 1. 译者的喜好

关于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翁显良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小说翻译,最好坚持三个前提:一曰熟,二曰近,三曰得。所谓得,指的是读了原作有所感受,产生共鸣,得之于心。”<sup>[10]</sup><sup>[69]</sup>这三个前提对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谈到文本选择与译者责任,葛浩文表示,“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sup>[11]</sup>莫言小说善于表现人性的黑暗面,葛浩文自陈,他本人的阅读兴趣也基本认同“人性本恶”的说法。他曾自豪地宣称,“我的译本基本上代表了英语读者所能接触到的中国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精华”。<sup>[12]</sup><sup>[220]</sup>由此可见,译者喜好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直观体现。

#### 2. 市场与读者

当然,葛浩文在文本选择上也兼顾了市场及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葛浩文坦言,“很多时候一部作品能不能翻译,还得考虑出版社的市场利益。”<sup>[13]</sup><sup>[13]</sup>葛浩文对美国读者的阅读取向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大概喜欢两三种小说吧,一种是 sex 多一点的,第二种是 politics 多一点的。”<sup>[14]</sup><sup>[46-47]</sup>《红高粱家族》恰好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它以民间老百姓的视角再现了中国农村抗日的情形,贯穿其中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之间那令人称奇的传奇爱情故事,让读者发自内心地重新审视爱情、战争与人性。文本选择时兼顾读者和市场,是译者主体性中受动性和为我性的体现。

## (二)文本解读

译者和原文都具有各自的视界,译者必须充分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突破自身文化的束缚,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领悟作者的本意,达到二者的“视界融合”,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视界。译者在人名翻译时冲破语言文化阻碍,采用注重意译的“调试法”,体现了文本解读的主观能动性;文化负载词及俗语谚语翻译中,考虑到西方读者所处的文化环境,灵活选择翻译策略,体现了文本解读的受动性;最终成功实现了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体现了主体性之为我性。

### 1. 人名翻译

人名是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符号,读者可从名字本身联想到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葛浩文对人名的处理,主要采用了两种做法。一种为音译,对于无特殊意义的人名,首选的办法是音译,如:余占鳌译成 Yu Zhan'ao,戴凤莲译成 Dai Fenglian。第二种为“调试”翻译法。对于具有特殊涵义的人名,葛浩文往往采用改变源语语义和视角的“调试法”,借由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意译巧妙传达名字的内涵。“刘罗汉”被刻画为一位德高望重、刚正不阿的老长工。在佛教中,罗汉是伟大的佛陀得法弟子修证最高的果位。由此可见,作者对“罗汉”的命名寓意深刻。葛浩文凭借深厚的中文造诣,采用增译的方式,调试了“罗汉”的语意,并在行文中加以注释,精准地将其译作“Arhat Liu, named after Buddhist saints”,使注释成了文学的译文。此外,恋儿(Passion),倩儿(Beauty),安子(Harmony),哑巴(Mute),花脖子(Spotted Neck),冷麻子(Pocky Leng)等人名的翻译也均体现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巧妙发挥。“调试法”的合理使用是译者在忠实原文基础上,为传达原文神韵所做出的调整,这种调整既体现了原文对译文的限制,也体现了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做的主观努力,能动性、受动

性、为我性均有体现,实现了译者主体性的恰当发挥。

### 2. 文化负载词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译者不仅要从本民族的角度去感知异族文化,还能从异族文化持有者的角度认知异族文化,这是“跨文化意识的最高境界,要求译者具有‘移情’和‘文化融入’的本领。”<sup>[15]167</sup>

例 1:还是“干爹呀”“湿爹呀”!<sup>[16]167</sup>

*Foster-dad? That's a "bloodless" relationship. Yours is "blooded".*<sup>[17]296</sup>

“干爹”是“义父”的俗称。“干”在此处是指无血缘关系而拜认的亲属,带有颇为浓厚的人情味道。“干”在此处相对应的反义词应是“亲”,即为有血缘关系的至亲。余占鳌和九儿的关系在当时尚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豆官虽为余占鳌的亲儿子,却只能一直称其为“干爹”。除却“干”和“亲”,汉语里“干”与“湿”亦是一对反义词,奶奶因爷爷不敢承认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满腹抱怨,便随口杜撰了本不存在的“湿爹”一词,借此委婉地讽刺爷爷。此处的双关颇为精妙,幽默风趣,将汉语的丰富多彩展露无遗。面对如此匠心独运的原文,葛浩文抛却了此处语言的包装,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原文涵义传达了出来,同时译文的“bloodless”和“blooded”巧妙运用了头韵的修辞,与原文的双关修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实为译者主体性恰当发挥的典范。

例 2:曾外祖母唠唠叨叨:“小祖宗哟,你不吃不喝,是成了仙还是化了佛?你把娘难受死了哟!”<sup>[16]78</sup>

*'You little urchin,' Great-Grandma grumbled, 'do you think you're an immortal or a Buddha who doesn't need to eat or drink? You'll be the death of your own mother!'*<sup>[17]90</sup>

“小祖宗”是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埋怨或责备小孩

顽皮时的常见用法,大人将小孩喻至祖先般尊敬的地位,以示孩子的淘气和难伺候。此处体现的是曾外祖母对九儿不进食的焦虑,哄骗之中亦体现出一丝疼爱和责备。中国人习惯将自己的祖先置于“俗神谱系”之中,但西方则很少用此类表述传达安慰和哄骗之意。葛浩文精准抓住了此处的文化涵义,并未将其译为“little ancestry”,而是采用归化的策略将其译成“little urchin”,实为精妙。“urchin”在英文中是“淘气鬼,顽童”之意,与原文传达之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仙”和“佛”,葛浩文则采用了异化的策略,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古老的宗教文化体系。此处译者充分发挥了其译者主体性,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交替使用,不仅保留了原语特色,而且还不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译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 3. 俗语骂语

俗语反映人民生活经验和愿望,是一类简练且通俗流行的语句。作为译者,需解读破译其中隐含的文化因素,并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展现原文语言文化特色。骂语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时需揣摩说话人的感情色彩,从而找到译入语中色彩相当的词语进行翻译。译者在文本解读和阐释中扮演着斡旋中介的角色,这正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例 3: 掌柜的,别难过啦,破财消灾。<sup>[16]101</sup>

*Don't be sad, Master. Financial losses, lucky bosses.*<sup>[17]116</sup>

例 4: 大风刮不了多日,亲人恼不了多时。<sup>[16]140</sup>

*Strong winds eventually cease, unhappy families return to peace.*<sup>[17]157</sup>

“破财消灾”是我国民间俗语,当人们遭遇物质或金钱上的损失时,往往就会用“破财消灾”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的心灵。酒庄掌柜单廷秀的庭院无故起火,此处正是长工刘罗汉对东家的安慰。葛浩文采

用了意译的手段,不仅领会并传达出了该俗语的含义,还不经意间吻合了二者之间的主仆身份。因为俗语本身的特点就是约定俗成且形象精练,所以葛浩文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例 4 的俗语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把原意生动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俗语的一大特征便是其口语性,多是口语形式的通俗易懂的短句或韵语,读起来很好听。此处葛浩文的译文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原文涵义,而且形式上更是前后押韵,朗朗上口,译文更像是纯正的英语习语,流畅自然,没有一点翻译腔,不禁让人感叹葛浩文“重写”功底之深厚。借由其译者主体性的巧妙发挥,葛浩文的译文使译入语读者感受到了不少于源语读者的阅读韵味。

例 5: 杂种! 小杂种! 六亲不认的小杂种!<sup>[16]119</sup>

*You misbegotten ingrate!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 can turn your back on your own family?*<sup>[17]135</sup>

例 6: 我要去杀这些狗杂种!<sup>[16]287</sup>

*I'm going to kill those dog bastards!*<sup>[17]303</sup>

“杂种”是我国常见骂语,表达对另一人的极度厌恶之情。此处是外曾祖父拿九儿没办法时的气话,并非对亲生女儿真正的辱骂。如若把这些骂语按美国俚语意译过来,就很容易与文本人物的感情色彩产生偏差,破坏人物和语言环境间的微妙关系。例 6 则表达了余占鳌对铁板会的仇恨,此为语言激烈情况下讲出的粗俗语。值得一提的是,中西方文化中分别赋予了“狗”截然不同的内涵。西方国家往往视其为忠诚的象征,多情况下是他们赞美和褒扬的对象。而在中国,特别是过去,人们对“狗”并没有什么好印象,比如“走狗”、“狗仗人势”等。此处译者摒弃了文化差异,采用了中西结合的翻译策略,套用译入语中地道的骂语进行译介,不仅体现了原文的语言风格,也表达出了其深层意义,所达到的效果与原文本所差无几。总之,借由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葛

浩文的译文不仅忠实地保留了原文中人物语言的特点和身份,也还原了原作塑造的人物形象。

### (三)翻译过程

翻译过程主要是受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限制,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受动性;译者站在译入语读者的角度进行处理,从而达到服务目标语读者与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体现了翻译过程的能动性和为我性。

避讳是语言中的普遍现象,源于人类童年时代语言拜物教。《汉语大词典》对“避讳”的解释为:“修辞学上辞格之一。说话时遇有触犯忌讳的事物,不直说该事该物,而用旁的话来委婉地表述。”<sup>[18]452</sup>

例 10: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sup>[16]66</sup>

*They ploughed the clouds and scattered rain in the field.*<sup>[17]75</sup>

例 11:从此,爷爷和奶奶鸳鸯凤凰,相亲相爱。<sup>[16]139</sup>

*From that day on, Granddad and Grandma shared their love like mandarin ducks or Chinese phoenixes.*<sup>[17]156</sup>

“云雨”原指古代神话传说中巫山神女兴云降雨之事,本是上好的自然景观。但是语言经历着神奇的变化,中文的“巫山云雨”渐渐生出了男女缠绵情爱的另外含意。<sup>[19]320</sup>

“耕云播雨”通常指控制降雨和改造自然,比喻辛勤劳动。此处作者将“云雨”之意巧施于“耕云播雨”之中,是一种含蓄而精妙的描写。“鸳鸯”在中国往往被视为爱情的象征,“凤凰”则常用来象征祥瑞,亦有“爱情”、“夫妻”之意。“鸳鸯凤凰”在此处意同“云雨”,也是对男女情爱的委婉表达。面对此类极具中国古典韵味的避讳语,葛浩文为使译入语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化美妙的异域色彩,采用了等额翻译的手段,通过忠实的直译,达成了传播中国特色表述的目的。以上两例中,译者都在不影响译文读者获

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理解的情况下,恰当发挥了其译者主体性,运用异化的策略很好地传递了中国文学的叙述特点。

例 12:“怎么?你被他坏啦?!”<sup>[16]147</sup>

*'What's wrong? Did he rape you?'*<sup>[17]165</sup>

例 13:爷爷与她总归是桑间濮上之合。<sup>[16]91</sup>

*So she and Granddad were adulterers.*<sup>[17]104</sup>

“坏”原指“让人难堪、吃苦头等”,在此处取“毁”之意。在民间表达中,“坏”的含义更深一步,此处是对“蹂躏”的避讳表达。“桑间濮上”则意指男女幽会,淫靡风气盛行之地。此处的“坏”与“桑间濮上”是另一种避讳描写,只是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有“糟蹋”与“野合”之意,一般不用于对美好爱情的表达。因此,出于对中国作家的了解,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大胆采用了意译的手段,在小说未臻完美之处为之补缀,帮助莫言说出了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莫言曾这样为译者辩护:“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的缺陷。因为我知道,一个美国人在性描写方面,总是比一个中国人更有经验。”<sup>[20]170</sup>通过译者主体性的巧妙发挥,葛浩文不仅将中式传统表达传递到了西方,也使得莫言作品在海外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

### 四、结语

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对外翻译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葛浩文借由其译者主体性的恰当发挥,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首先,他依据个人喜好,兼顾市场和读者进行文本选择,使中国文学打开了西方阅读市场;其次,他精通中英双语及中西文化,在文本解读方面亦是游刃有余;最后,面对源语中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他在翻译中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葛浩文对《红高粱家族》

的英译是恰当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典范。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译者应化身为文化使者,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

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恰当发挥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了十分有益的启示。首先,翻译的选材必须要做好。在世界渴望了解中国的现在,“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契机,积极与世界接轨,针对性地选择西方世界感兴趣的素材进行翻译。”<sup>[21]</sup><sup>57</sup>其次,尊重文化交流与沟通。在全球化的当代,不断的借鉴和交流可加快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进程,在充分的多语文化基础上,译者才可游刃有余地准确解读异域文化。再次,对外翻译策略需适当转变。面对“译入”与“译出”之间的矛盾,很多译者会刻意采取对抗式的异化策略。但现在尚不该过分夸大民族特征,既然国家已将文化强国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那么就必须要考虑实效,针对不同文本和语境,通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进行译介。为建设真正的文化强国,我国应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促进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采用积极战略推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

#### 参考文献:

- [1] 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 中国翻译, 2010(6): 10-16.
- [2] Urdike, John. Bitter Bamboo: Two Novels from China[N]. The New Yorker, 2005.
- [3] 邵璐. 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J]. 中国翻译, 2013(3): 62-67.
- [4] Goldblatt, Howard. Mo Yan, My Hero[N]. The Guardian, Oct. 12th, 2012.
- [5] Goldblatt, H. 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 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 Newman Prize[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9(July - August): 28-29.
- [6] 史国强. 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J]. 东吴学术, 2013(5): 103-123.
- [7] Inge, M Thomas. 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0(6): 501-506.
- [8] 查明建.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1): 19-24.
- [9] 方梦之. 译学词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10] 霍跃红. 本色译者——汪榕培[J]. 中国翻译, 2005(5): 68-70.
- [11] 曹雪萍, 金煜. 葛浩文: 低调翻译家[N]. 新京报, 2008-03-21.
- [12] Goldblatt, Howard. Border Crossings: Chinese Writing, in Their World and Ours[A]. In Corinne Dale(ed.). Chinese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C].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13] 舒晋瑜. 十问葛浩文[N]. 中华读书报, 2005-08-31(13).
- [14] 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6): 45-56.
- [15] 段峰. 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 [16]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 [17] Goldblatt, Howard. Red Sorghum. New York: Arrow Books, 2003.
- [18] 汉语大词典(第二卷)[M].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03.
- [19] 张映先. 《红楼梦》霍克思英译本中避讳语翻译的伦理审视[J]. 红楼梦学刊, 2010(2): 306-322.
- [20] 莫言. 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J]. 小说界, 2000(5): 170-173.
- [21] 辛红娟, 张越, 陆宣鸣. 从葛浩文英译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以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为蓝本[J]. 当代外语研究, 2014(2): 56-57.

(责任编辑: 刘晓红)